

近现代中国
政治
与社会变迁



思想与时代的落差

——晚清外交官刘锡鸿研究

The Gap Between Thought and Times



张宇权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总序

“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学术研究丛书是广州中山大学“985”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重点是研究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政治是一个涵义广泛、内容复杂的概念。本课题将政治作广义的论述，研究视野拓展到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国际环境、对外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重要政治人物和重大政治事件，将政治与社会结合起来，考察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影响、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和文明进步、政治与对外关系，尤其是对一些重要人物的政治态度和他们的治国理论、方针、手段造成的社会影响，做多角度、多层面的透视，试图用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就政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做新的探索，用社会的稳定、进步、发展和文明的程度来衡量与评论政治思想、主张和政治人物施政的正误。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近代中国政治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架构下形成的。以资本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为一方，掌握中国的统治权；以广大的爱国、革命的人民大众和追求进步、追赶时代潮流的各种知识分子作为另一方。两方代表着中国的两种社会势力，反映近代中国的两种前途，他们的政治理念、思想，以及改革中国的主张制约着近代中国的发展路向。近代中国政治是考察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中



心内容和基础背景。现代中国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广大人民的手里,国家的权力中心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国家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文化和教育,使中国社会迅速发展。以往中国近现代史在各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和显著突破,但是也有不足,比如控制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枢纽——政治变迁,对社会影响的研究较为薄弱,有更迫切研究的需要和更高的要求;研究重心有从社会各面向中心回归的发展趋势和从具体研究向整体把握提高的客观要求。既往的政治史研究,着重于讲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单向性地解释政治变迁给社会造成的动荡和不安,对经济、文化、教育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近现代中国政治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理论的提高。本课题把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互动作为基本切入点,在既有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富于创见和有时代特征的宏观阐释系统,以观察视野的拓展和研究层面的深入为主导,通过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和方法的创新,提升研究水平,开辟新的路径。

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从整体上看,过去的研究兼具成果数量多而缺陷严重的双重特点,可以进一步开发的空間仍然较大。我们中山大学在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有良好的传统和优势,在孙中山与近现代中国政治等方面的研究走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前列,讲求学术规范,长期以来形成求实求真的精神和相互协作的学术风气,在多个方面颇具潜力。参与“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课题研究的有老一辈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有博士后研究者,其余均是取得博士学位的博士,是一个老中青结合的研究班子,各人就其兴趣和研究所得进行新探索;不少论著是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曾获得答辩委员的良好评价,经过反复修改才拿出来出版示人的作品。他们围绕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从不同视野和不同角度进行的专题研究各

有特色、各有优长,具有前瞻性和学术性。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学术丛书,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希望这些成果能对人们从新的角度理解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有所帮助与启迪。当然,我们更期望读者和学术界的批评和指正。

天津古籍出版社在得知我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之后,慨然应允,表示将以最快的速度 and 高质量组织出版这套丛书。我们除了对他们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外,也对他们为出版学术著作、传播精神文明的精神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和钦佩。

林家有

2003年11月于广州

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



总
序



序 言

林家有

张宇权的著作《思想与时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刘锡鸿研究》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多次反复修订而成的。刘锡鸿祖籍广东,是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著名的反洋务论者,曾任清朝驻英使馆副使和驻德使馆公使,是近代中国较早走向西方,接触西方,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有一定了解的外交官员。他认识到西方的先进,但又不能与时俱进,回国后思想和行为都极为守旧,成为维护清朝统治,最终成为为清朝送终的典型保守派人物。这类人物很有研究的学术价值,但由于材料缺乏的原因,除了一些有关的论文发表之外,有关刘锡鸿的专著至今尚未见到。

张宇权同学是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自他投奔到我的门下跟我学习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攻读博士学位后,我曾鼓励他选取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较为保守的人作为研究方向。因为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而作为文化的载体——人,也必然是既有先进的文化人,也有保守的文化人,这两种文化人的存在都是特定时期特定文化的产物。只研究先进的文化人,忽视或轻视对保守的落后的文化人的研究,不能就文化的全部内涵和文化人的思想作全面的研究,不能从正反两个方面去总结



历史经验,就难于正确地全面地认识中国历史文化,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历史的昨天也无益处。所以,研究历史上的保守文化人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张宇权选择刘锡鸿作为研究方向后,他认真地搜集材料,在故纸堆中爬梳,历尽艰辛,他的精神和毅力,以及应对史料欠缺所表现出来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作为他的老师十分了解,心中对他有赞许,也有怜悯,更有期待,也还有对他的批评,但正如他所说:他没有让我失望。

刘锡鸿虽属保守派,并成为清朝的卫道士,但他也不是一无是处。他有镇压农民起义的佐幕生涯,也有为清朝政府建言整顿吏治,提倡善民和重视内政,稳定社会,安定民心的经历。他出使英、德后,曾经认真地了解英、德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情况,但由于他不能正确地认识西方,也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所以不能正确区分先进的西方与侵略的西方,由于保守民族主义的因循,他产生抗拒西方文化的情绪,用文化专制主义与排外主义,反对西方文化,成为“用夏变夷”的鼓吹者。由于思想与时代的落差,使刘锡鸿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张宇权通过对刘锡鸿出国前后思想的变化,以及行动的考察,追寻他保守思想形成的原因、特点及其在近代中国的命运。比较客观地分析刘锡鸿思想的两面性,说明刘锡鸿的保守思想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既未能抵御侵略,也未能起到挽救整个民族的作用,但也指出刘锡鸿治理国家必须“审义明道”,强调吏治清明,强调社会风气,强调仁义道德的思想,无疑是在中国近代化道路进程中应注意的地方。

综观全文,本书的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对刘锡鸿各方面的论述均有一定的深度和厚度,对他保守思想形成的原因和思想特点的评述较为合理,然而与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一样,作者的这部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学术回顾	2
一、大陆部分	2
二、港台及海外部分	9
第二节 研究意义、方法及资料来源	15
一、研究意义	15
二、关于研究方法的几点说明	18
三、关于研究资料	19
第二章 出国前的生活与思想	20
第一节 早年经历	20
一、镇压农民起义的佐幕生涯	20
二、任职京都期间的社会交往	29
三、保守思想与洋务思想之争	35
第二节 出使前的治国思想	46
一、吏治思想	47
二、养民思想	59
三、商贾思想	73
四、财政思想	79



五、军事思想	85
六、外交思想	99
第三章 出使英国	113
第一节 清政府遣使的由来	113
一、清政府的外交心态	113
二、清政府遣使的由来	117
第二节 出使的缘由及出使制度	129
一、马嘉理事件	129
二、刘锡鸿出使的缘由	131
三、国人对首批驻外使节的评价	139
四、有关驻外使臣的各种规定	140
第三节 驻英国使馆的建立	147
第四节 刘锡鸿与郭嵩焘的矛盾	154
第五节 《英轺私记》的泰西观	179
一、对社会民俗的认识	180
二、对工商贸易的认识	188
三、对文教科技的认识	193
四、对西方政体的认识	199
五、对西方军事的认识	203
六、对国际外交的认识	212
第四章 出使德国	219
第一节 驻德使馆的建立	219
第二节 驻德期间的作为	228
一、在德国的外交往来	228
二、对德国政治军事体制的考察	229
三、关于中德修约的交涉	230

第三节	驻德期间的思想变化	232
第四节	“用夏变夷”的失败与坚持	238
第五章	晚年境况	243
第一节	回国以后	243
	一、回国经过	243
	二、回国后的工作和任职	246
	三、参劾李鸿章	248
第二节	关于海防	252
	一、《访求筑造炮台模式折》	252
	二、《筑造炮台未尽事宜书》	255
	三、《筹办海防画一章程十条折片》	257
第三节	关于铁路	263
	一、铁路问题产生的缘由	263
	二、对修建铁路的主张	265
	三、《仿照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	269
第六章	对刘锡鸿保守思想的思考	277
第一节	刘锡鸿保守思想的成因	277
	一、个人的生活经历	277
	二、儒家思想的影响	280
	三、鸦片战争后的社会氛围	284
	四、清代的文化专制主义与排外主义及反西化的 历史渊源	285
第二节	刘锡鸿保守思想的基本特点	288
	一、变与不变的交替	288
	二、开明与保守的混合	290
	三、守旧与“卫道”的错位	292

刘锡鸿保守思想的成因



目
录

四、思想与时代的落差 294

第三节 刘锡鸿保守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296

附 录 刘锡鸿生平大事年表 302

参考文献举要 306

后 记 317





著作也肯定会有不足,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也许会有各种感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不赘。我作为本书的最早读者,写了以上一些话作为读后感,我期待着宇权同志能继续努力,在今后的研究中取得更加丰硕的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成果,是为序。

2003年9月10日
于中山大学永芳堂书斋



第一章

绪论

刘锡鸿,原名锡仁,字云生,广东省番禺县捕属人,原籍新会县沙滘乡。道光二十八年(1848)中举^①,是晚清首任驻英副使和驻德公使,也是洋务运动时期著名的反洋务论者。有《英轺私记》和《刘光禄遗稿》传世。

① 汪兆镛编:《碑传集三编》卷7,《刘锡鸿传》,991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刘锡鸿生卒年俱不详,但知他的生日是六月二十六日。参见《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63页。据朱维铮先生推测,“依据刘由中举至罢官共历三十三年(1848—1881)估算,他的生卒年可能与郭嵩焘相近,据《刘锡鸿传》说他革职后‘仍居京师,数年卒’,则死时可能已六十余岁”。参阅朱维铮主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导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6月版,28页。再据英国报纸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的报道指出,正使郭嵩焘约五十九岁,副使刘锡鸿较正使年轻约四、五岁。郭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若依英国报纸的推算,刘锡鸿约生于道光二年(1822)或三年(1823)。参见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24 Feb. 1877, 转引自雷俊玲:《清季首批驻英人员对欧洲的认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9年版,127页。

第一节 学术回顾

一、大陆部分

对刘锡鸿的研究,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才开始的^①。在 80 年代初,先后出现了三本关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专著,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对刘锡鸿的经济思想做了研究分析,这些作者都对刘锡鸿持否定态度,斥其为“封建顽固派”。

第一本是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该书第六章是对刘锡鸿的专论,书中首次提到了刘锡鸿的生平,并对他的外交思想和经济思想进行了评论。总体来说,作者认为:“刘锡鸿在对待西方工业、科技技术以及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方面,是一个死硬的‘攘夷’论者,而在对待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方面却是一个最为厚颜无耻的‘抚夷’论者”^②。

第二本是侯厚吉、吴其敬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该书第三章有一节专门评述了刘锡鸿的经济思想,认为他“既是顽固派又是投降派”^③。这本书还首次提到了刘锡鸿与郭嵩焘的特殊关系,并认为刘锡鸿出使西洋的原因是受国内顽固派派遣去监视郭嵩

-
- ① 关于民国时期对刘锡鸿的研究情况,主要有彭泽益《郭嵩焘之出使西欧及其贡献》及柳定生《郭嵩焘传》两文,但这两篇文章都是对郭嵩焘研究的专文,对刘锡鸿仅是提到,研究内容较少,故在此不做介绍。参见彭泽益:《郭嵩焘之出使西欧及其贡献》,《文史杂志》,第 3、4 期合刊,11~24 页,民国三十二年八月,重庆;柳定生:《郭嵩焘传》,《史地杂志》,1 卷 1 期,35~41 页,1937 年 5 月,杭州。
- ② 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修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0 年版,391 页。
- ③ 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162 页。



焘的。对于他的经济思想,书中分为重农抑商的生财耗物论,铁道、轮船、机器等“有害无利”论和理财观点三个部分,分别对刘锡鸿经济思想的保守性进行了分析批判。

第三本是胡寄窗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①。在此书第十二章“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的洋务和反洋务思想”中,作者把刘锡鸿和曾廉作为不同时期反洋务的两个典型进行论述,但内容没有超出前两本书。

上述三本书所引述的关于刘锡鸿的资料基本上没有超出《刘光禄遗稿》和《英轺私记》。引用资料不完整,是三本书的一个共同缺陷,即使引用上述有限资料,也存在片面性的问题。如侯厚吉、吴其敬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引用了《刘光禄遗稿》中反船械的言论,却没有引用《英轺私记》中主张购买船炮,自制船炮的言论^②。另外两本书亦存在类似的问题。此外,关于刘锡鸿出使英国是受顽固派指使的问题,三本书并没有提出证据加以证明。还有,关于郭嵩焘对刘锡鸿出使英国的态度问题,《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一书所引用的郭嵩焘晚年所写的《玉池老人自叙》资料并不可靠^③。但不管怎样,这三本书是大陆研究刘锡鸿的开山之作,他们为刘锡鸿所下的结论,基本上为后学者所赞同。

这一时期研究刘锡鸿的学者还有熊月之先生。1983年,熊月之先生发表了《郭嵩焘出使述略》^④和《论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纷争》^⑤

①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 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75~176页。关于刘主张买船、造船的言论,请参看《与博郎论海防后记》,《英轺私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194~198页。

③ 关于《玉池老人自叙》史料可靠性的研究,可参看夏泉《郭嵩焘出使英国时的矛盾心态》一文,《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

④ 熊月之:《郭嵩焘出使述略》。《求索》1983年第4期。

⑤ 熊月之:《论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纷争》。《华东师大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6期。



两篇文章。在《郭嵩焘出使述略》一文中,作者简要提到郭嵩焘和刘锡鸿的矛盾,其内容可在《论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纷争》一文中找到,故在此仅介绍后文。在此文中,作者首次较为详细地论述了郭嵩焘和刘锡鸿二人的关系,并能够运用关于刘锡鸿弹劾郭嵩焘的新材料,对二人矛盾发展的经过形成大概的认识。作者还对郭刘二人的思想进行了分析和对比,认为“郭、刘的矛盾冲突,正是他们思想分歧的必然结果”,郭、刘的冲突是“当时中国社会急剧的代谢过程中新旧两种思想激烈碰撞所激起的浪花,反映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与封建守旧士大夫的思想对立”^①。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一样,在郭刘出使英国的问题上,作者较多引用郭嵩焘的材料,而关于刘锡鸿的材料较少引用,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文章客观性。还有,对于郭刘的矛盾,总署各大臣以及李鸿章所持的态度,作者没有更多地论述。不管怎样,这篇文章是大陆第一篇以研究刘锡鸿为主的文章,它对郭刘两人矛盾思想来源的分析是精彩的,它的基本结论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正确的。

如果说熊月之先生的《论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纷争》仅是论述郭嵩焘与刘锡鸿矛盾的文章,还不能完全算是对刘锡鸿的专论的话,那么钟叔河先生的《刘锡鸿“用夏变夷”的失败》一文,可以说是大陆第一篇关于刘锡鸿的专论。这篇文章是为其所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中刘锡鸿《英轺私记》所写的序言,因此,全文就《英轺私记》中刘锡鸿的思想进行了分析,并对刘锡鸿与郭嵩焘的矛盾进行了论述。文章认为“不管郭和刘的矛盾如何,毕竟主要是主张向西方学习和反对向西方学习二种不同态度的矛盾,性格冲突并没有掩盖也不可

^① 熊月之:《论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纷争》。《华东师大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6期,79、81页。



能掩盖这一点”^①。在承认郭、刘性格不同的同时,强调两人矛盾主要在于是否向西方学习,这是该文的一个特色。文章的另一个特色是作者并没有完全否定《英轺私记》中刘锡鸿的思想,认为“尽管刘锡鸿观点十分保守,态度也很顽固,但他却并非完全没有观察事物和思考问题的能力”,到了英国后,刘锡鸿是“半推半就地认错”^②。这同以往研究认为刘锡鸿到国外后思想也没有什么变化有很大不同。然而作者在刘锡鸿如何得以出使这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上并没有什么突破,依然认为总署大臣这种安排是为了使他们互相钳制,彼此掣肘^③,而且仍旧采用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中不可靠的材料来证明当时郭嵩焘是反对刘锡鸿出使西洋的,这是此文的一点不足^④。

如果说钟叔河先生《“用夏变夷”的刘锡鸿》一文开始一分为二地分析刘锡鸿在欧期间的思想的话,那么宫明先生的《刘锡鸿的反洋务思想及其演变》一文对刘锡鸿在欧洲思想的分析则达到了新的高度。文章特色之一是,对出使前刘锡鸿的思想进行了较有深度的分析,认为当时刘并不是完全反洋务的。作者在指出刘锡鸿反洋务三点思想(反“海防之议”、反购船械、坚持抑商)的同时,也指出他有两点思想与洋务派是一致的(关于对外国侵略性质的认识和提倡对

-
- ① 钟叔河:《刘锡鸿“用夏变夷”的一次失败》,《英轺私记》序,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24页。此文收入钟叔河著《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一书,中华书局,1985年版。
- ② 钟叔河:《刘锡鸿“用夏变夷”的一次失败》,《英轺私记》序,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27页。
- ③ 钟叔河:《刘锡鸿“用夏变夷”的一次失败》,《英轺私记》序,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16页。
- ④ 钟叔河:《刘锡鸿“用夏变夷”的一次失败》,《英轺私记》序,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22页;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247页。



洋人“以诚以信坦怀相示”),这就和以往单纯认为刘锡鸿的思想都是反洋务的观点区别开来。文章特色之二是,认为出使期间刘锡鸿“对自己出国以前的洋务思想作了某种程度的反省和修正”,且“对资本主义的政教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热情赞誉”。这种观点比钟叔河先生又前进了一步。特色之三是,对刘锡鸿出使西欧的原因,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把刘“当作是封建顽固派有意在郭嵩焘身边安上的一颗钉子,是预先派去钳制监视郭嵩焘的,则似乎有点过于简单化了”;刘锡鸿赴英“最先是出自郭嵩焘本人的建议,而不是封建顽固派的有意安排”,虽然在刘确定出使后,“封建顽固派如李鸿藻等人,曾积极对他施加影响,做过一些争取拉拢的工作”^①。这三点特色,把对刘锡鸿的研究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91年,葛志华《论“刘锡鸿现象”》一文对刘有了一个新的定位。认为刘锡鸿出使英国后,“从对封建专制政治的歌颂,到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朦胧赞美”,“从对异族的贱视,到对异族的赞颂”,“从斥科技为‘刳天剖地、妄矜巧力、与造化争能’,到认为科技可以富民强国”,其政治思想、文化心理、科技认识都有了一定的转变和进步。但是,“刘锡鸿的转变是局部的,进步又是有限的”,这种变而不化的“刘锡鸿现象”,“既是近代中国落后的产物,又反过来束缚了近代中国的进步,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在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道路上埋下了一颗‘心理炸弹’”^②。虽然作者对于刘锡鸿在英国的思想转变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对这种转变不能准确分析,实际上,刘锡鸿是一直反对西方科技,反对使用机器的。另外,全文仅限于对刘锡鸿在英国的思想进行分析,出使前和回国后的思想都未

① 宫明:《刘锡鸿的反洋务思想及其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5期。

② 葛志华:《论“刘锡鸿现象”》。《南通师专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2期。